

名家读史笔记

杨天石◎主编

写在历史的边上

王季文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名家读史笔记

杨天石◎主编

写在历史的边上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在历史的边上 / 王学泰 著; 杨天石 主编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60-8857-2

I. ①写… II. ①王… ②杨… III. ①中国历史—史评—文集
IV. ①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110 号

写在历史的边上
(XIE ZAI LISHI DE BIANSHANG)

作 者: 王学泰
主 编: 杨天石
责任编辑: 戴燕白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57-2
定 价: 5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36

学泰那个文字啊，老到。这个确实经过炼狱炼过以后的。

——邵燕祥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李璿平的“门客文化”鼎足而三。

——鄢烈山

他（王学泰）经历了人生那么大的灾难，他不夸张，就是自己亲历的事情。最难得的，我跟邵先生感觉一样，他的清醒，也就是他的觉悟。他最难得的是他的清醒和觉悟。

——王得后

“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序 |

读了几十年文章，自己也写了几十年文章，说老实话，大部分文章都淡忘了。即使是自己写的，虽曾呕心沥血，一笔笔写，一键键敲，但是，也大都淡忘了。题目，自然记得；内容，却只记得大概。但是儿时读过的一些文章，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至今不忘，有的还能自头至尾地背诵。为何？我想，其原因首在于小。人的记忆力都有限，谁记得下，背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文、长文！纵观中国文化史，能够流传千古、传诵不衰，刻入民族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文，篇幅虽短，却小中见大，精光独具。

感谢东方出版社愿意再版我多年前的旧作《横生斜长集》，而且希望我主编一套小文丛书，我觉得此意大佳，幸得邵燕祥、王学泰、陈丹晨、雷颐诸大家支持，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书。

我虽然提倡小文，钟情小文，但是，并不排斥大文、长文、大著、巨著。宇宙万物，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用。古人云，“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此之谓乎？

杨天石

2016年7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I 自序

钱锺书先生散文名著《写在人生边上》，享大名七十余年，拙作的命名难免效颦之讥。不过钱先生的“人生边上”只是一个比喻或象征，他把人生看作“一本大书”，人们的写作不免是为这本“大书”做“书评”，而钱先生把自己的写作列在另一类：

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 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从序中可见钱先生写作时的随意和潇洒；而拙作“历史的边上”却是实指，所谓“历史”就是指史学，所谓“边上”就是边边沿沿的一些小事件、小问题。

我是学文学的，近几十年来工作在文学研究所，以往的写作都与文学有关。可是，我私心所好却在于史。因此，读史书往往比文学多，特别是退休以后，不承担集体项目了，当读书成为休闲的时候，我更着意于历史。当然我读史不同于以研究为目的的史学家，我也注重趣味，或者如当今青年人常说的“好玩”，然而遇到问题，总喜欢刨根问底，有时也很纠结。偶有所得，敝帚自珍，于是便有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虽然所涉及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文革”之前历史研究承担着重大使命，见诸报刊的文字都属于宏大叙事，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所谓的“五朵金花”（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后来史学圈子里戏称之为“显学”。这种研究风气的短处就在于把十分具体、生动的历史处理成干僵硬的规律与条款，令人望而生畏。这种研究与丰富、多样、生动的传统史学相比较，很不相称。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史学研究做得最好，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九十年代以来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活跃于荧屏，极大地带动了史学的通俗化，许多以历代史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成为出版界的抢手书，这在普及国史知识的正面作用之外，也不免有许多误导，其原因在于以往的基础研究不到位。不仅电视剧中出现许多违背历史常识的现象，就是通俗史书的硬伤也不少。我想史学界的饱学之士也许不太关心这些，而我这个旁观者自幼便有了插嘴的习惯。当然这些拾遗补阙的文字，谬误、琐屑也在意中，好在古人有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聊以自嘲和自解吧。

本书所收录有读书随笔，也有报刊约稿，无一定体例，但要编成一个集子，还是按照文章内容稍加分别为好。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润物无声说风俗，谈传统风俗习惯；第二部分：萧规曹随论制度，议论历史上的制度与规则；第三部分：书海世情偶一瞥，记最近

几年来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与历史有关的时事以及我的一些议论。当然，这种分类只是为阅读提供些方便，希望读者不必胶柱鼓瑟。

王学泰

目 录

润物无声说风俗

- 002 | 话说元旦
- 004 | 立春琐谈
- 009 | 清明节的变异
- 013 | 杏花·春雨·江南
- 020 | 端午节祭与祭祀泛滥
- 023 | 礼乐文化中的玉
- 026 | 村社组织的黏结剂：传统礼俗
——读《礼失求诸野》

萧规曹随论制度

- 038 | 软约束与硬规范
- 040 | 冷血皇帝——乾隆

- 043 | 说“罪己诏”
- 061 | 说“皇恩大赦”
- 075 | 科举制度的本质
- 080 |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作为皇权统治弹性机制的科举
- 085 | 远去一百年的贡院
- 089 |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
- 101 | 吏胥之害
- 110 | “吏治”与“治吏”
——评刘建基《中国古代史治札记》
- 116 | 王安石变法与钱

书海世情偶一瞥

- 124 | 汉字
- 128 | 粥的故事
- 134 | 淡：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 141 | 中英的改革与保守
- 145 | 说跪拜
- 151 | 说诚信
- 161 | 老北京的幽默
- 177 | 市场上应该有些闻香果

180		呼唤狂者与狷者
183		君子之德，常存敬畏
185		文化·“武化”·商业化
189		有感于“电影经典对白的评选”
192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197		有组织的犯罪·帮会·黑社会
200		又见“武林”
203		从“有鬼无害论”说到“有鬼有害”
207		做子民、臣民，还是做公民？
210		黄宗羲定律与“黑宗羲定律”
213		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
222		日记漫谈
234		“长毛状元”与《国朝诗别裁集》
244		《闲话藏书》的闲话
248		《丑陋的中国人》及其风波
254		写在历史的边上 ——读《中国好人》
260		审视清代会党泛滥的新角度 ——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266		“国学”不可能成为主流学派
273		传统的读书就是“慢读书”
284		再说传统读书



润物无声说风俗

话说元旦

元旦本来指元月元日，也就是口头上说的“大年初一”。现在农历上的大年初一，降格为春节初一，元旦专属阳历年的第一天。现在日历上虽然是阳历（或称公历、公元、新历、西历）、农历（或称阴历、夏历、旧历、废历）并列，但阳历占主流位置，官方以及社会使用的都是阳历，农历使用范围越来越窄，近些年来仿佛只有在“春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里人们才会想起农历。这些已成为习惯，用元旦称呼阳历新年也已成为语言定式，读者可能不知道它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磨合才完成的。

中国自古特别重视历法，自周代以来，每年秋冬之际朝廷把第二年的历书颁赐给诸侯或地方守令，确定每个月“朔日”（初一）。接受一个新朝，首先就要接受它的历法，这就是所谓的“奉正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们有了大同意识，不再自标独特，采用世界通用的阳历，直至今日。

然而，使用阳历不自1949年始。近读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集，书前附其年谱，其中记载辛亥年十一月（旧历）“十三日，孙文至南京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定是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许多学者也认为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使用阳历是用阳历始。

如果再细致一些，在此之前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已于1911年12月7日（阳历）上谕有“资政院奏、议决改用阳历”，并指示内阁宣布和“筹办”事宜。与中华民国政府相比早了23天。

为什么要使用阳历？一是进步，二是方便。清末民初，那时先进的知识人一改传统上“向后看”的观念，崇尚进步。在历法上也是如此，梁启超就说“歌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更重要的是方便，那时中国的大门被列强闯开，与世界交往增多，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阳历，据说不用的仅有俄国、日本、土耳其。中国外出使节感到特别不便的就是历法与服饰，所以早在光绪年间就有人向朝廷提出要剪辫易服和使用阳历。这两者看来既不关当朝的权力，也不损害其物质利益，但却是名分所系，一直没有通过。待武昌革命爆发，朝廷岌岌可危，甚至摄政王载沣也撂挑子了，于是在同一天也宣布“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翦发”并改用阳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上台强势推行阳历，老百姓尚未习惯，特别在过年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如民初学人李定夷所言：“吾国改用阳历，为期尚浅。故北京市面，表面上虽已于新历新年时，遍糊春帖，悬挂国旗，以志庆贺，而一切实际上过年之事，则阴历年底方纷纷准备。”（《民国趣史》）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也记载了民国四年（1915）元旦时“地方官厅，百端点缀，勒令民间过年，然应者不过国旗招展而已（间有被迫换桃符者）”。要全国老百姓都在阳历“元旦”过年，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但老百姓还是筹备过阴历年。无怪有人发牢骚说“反正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盖凡土地皆合塑男女像，男像曰土地公公，女像曰土地婆婆，故出幅云尔。然而读终上下幅，固未有不捧腹胡卢者。”（吴恭亨《对联话》）涉及风俗习惯变迁的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阳历使用更是如此。

立春琐谈

我们的民族自古以农立国，注重季节的变换，对于春季尤其敏感。早在商代，我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就可以看到“寅今春其至”（𠂔𠂔𠂔𠂔𠂔）“在春田受年”这样对春天充满欢悦和企盼的短句，让我们感受到三千年前的古人情感的激荡。代表民族情感的诗歌也有无数歌咏春天的诗句。《诗经》开卷的《关雎》《桃夭》等篇章都把男欢女爱的场景设置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都在展现着春季给大自然带来的无限生机。

其实抛开诗人的浪漫，春天不过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到某个方位罢了。地球和太阳不停地运动，春天会离去，下一个春天也还会再来，与我们过星期一、星期二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这是我们有了一些科学知识后的认识，而在上古时期，人类草昧初开，时间在他们意识中还是模糊一片的，就像庄子给我们讲的那位“中央之帝”“浑沌”，没有七窍，就是肉球一个。农业劳动、特别是播种与收获使人们对时间有了分段和循环的观念。商代人们开始把季节分成了春、秋二季。我们看到出土数以万计的甲骨中有“春”“秋”，而没有“冬”“夏”，因为这两季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春种秋收，在农人头脑里会留下最深的印象。

春字在甲骨文写作𠂔，《殷墟甲骨文引论》解释这个字时说：“从林、从草、从日、从屯，屯标声。象意字，象日照春阳，草木丛生。本义是春天。《说文》：‘春，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这段话的意思：春是个象意字（也就是许慎所说的“会意字”），象征

着太阳从丛林、丛草中艰难地升起。“屯”象征小草艰难地破土而出。金文、小篆春字略有变化，但都没有离开春回大地、万物萌生这一图景。春的发声来源于“屯”，春天虽然到来了，人们开始播种了，但从耕种到收获还要经历多少艰难，这正像小草出土一样。对于“春”古人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日”，太阳对于农耕是至关重要的。

商代已经有了对太阳的崇拜，《尚书·尧典》中就有帝尧派人“寅宾出日”（春分那天到东海之滨迎接太阳升起），因为古代帝王除了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外，还是精神上的领袖，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事务自然应由君王主持。到了汉代“天一合一”确立，于是，天子精神领袖地位突出了，“日”在《易经》中是象征君位的，迎接太阳的大典怎么能委托臣僚呢？儒家经典《礼记·月令》记载迎接太阳应该是天子。“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在这些日子里，天子还要“居青阳左个（大寝的东堂北偏室），乘鸾辂（青色带銮铃的车子），驾仓龙（青马），载青旂，衣青衣，服（佩带）仓玉，食麦与羊”，表示与天地配合。从这些仪式我们可以感受到，皇帝面对太阳时的严肃和谦卑。

春天带来了生机，人们也要相应地遵守一些规范和做一些事情，以“顺天之气”。从上到下要遵守：勿伐木、勿覆巢、勿杀幼虫、勿杀飞鸟、勿杀母麋鹿等，以及掩埋动物的遗骸，不能处决犯人，不能发动战争等。另外还要赦免轻罪的犯人，慰问孤寡，帮助贫弱，赏赐臣僚等。总之，在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里是不能逆天之道的，要对一切有生表示关爱。到底这些有多少能够切实做到，因为缺少记载，不能妄加评论。但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类（包括统治者）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这种思想意识有利于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天子”是精神领袖，皇帝就是世俗的统治者了。作为农业国的头领，皇帝还要表示自己也是农人中的一分子，所以，在立春の時

候，他还要行“藉礼”。

“藉礼”最早见于《国语》，就是在耕种“藉田”。“藉田”是天子、诸侯的私人田地，其出产是用来供奉宗庙的。天子千亩，诸侯五百亩。君王先去开犁，以表示对农业和宗族的重视，以后由农民替他耕种，这反映了氏族公社时期领袖与民众是有共同的祖先。据说周朝就有了这种礼仪，经过儒家的润饰越来越隆重，成为一种国家关注农业的仪式。汉代行藉礼的仪式是：皇帝亲载耒耜（古代翻地工具，可视为原始的犁），率领三公九卿到藉田，天子推三次，三公推五次，九卿九次。然而天子执爵，与三公九卿共饮“劳酒”。历代基本照此进行。

直到清朝末这个仪式一直在实行。不过北京较冷，立春时天寒地冻，行藉礼要迟至三月了。清光绪间二十四年那一年的耕藉田的仪式是在三月十六举行的。光绪间的起居注官（在皇帝身边记载皇帝言行的史官）恽毓鼎在其日记中记载：

皇上祭先农坛，臣毓鼎侍班。寅初朝服至门外账房，与同事齐班。灯前引导，诣坛下少憩。钟动，驾临。起居注官立于阶下东向北上。礼成，上诣具服殿更衣，行耕藉礼。毓鼎亦脱朝服，随至观耕台前。上御黄龙袍，横斜挂数珠。有着蓑笠二人，授鞭进耒。礼官前导，从臣数人牵牛扶犁，挈籽种水器以从，上执鞭随其后。田夫摇彩旗，唱田歌，往返四推毕，升观耕台。顺天府率耆老、农夫，在台前行礼。王公九卿，以次扶犁，皆九推。

这大约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行藉田礼，此时也可能是光绪一生心情最畅快时期，因为慈禧已经还政给光绪，光绪正在酝酿一次变法革新。本年即戊戌年，“百日维新”就在本年八月失败。从此以后，光绪被囚瀛台，不可能再出紫禁城行礼了。宣统继位，年龄太小，无行